

吴地人士与东吴兴亡

张承宗

东吴政权的创始人孙坚,相传是春秋时吴国名将孙武的后代。孙武的儿子孙明,食邑于富春,从此孙氏就成为吴郡富春人。①孙吴立国很大程度上依靠吴地人士,他们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吴地人士的进退,直接影响东吴兴亡。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吴地历史地理范围的由来及其演变

吴,也叫句吴,本为古国名。《史记·吴世家》载: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正义》云:“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索隐》引《吴地记》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从以上各种不同说法,可知吴地之中心当在今苏州。

春秋时吴国不断扩张,吴地范围逐渐扩大。《左传》成公七年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马陵之会,吴入州来。”杜预曰:“州来,楚邑,淮南下蔡县是。”《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吴伐州来。”二十三年又载:“吴灭州来。”据《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下蔡属沛郡,秦时为泗水郡,刘邦曾任泗上亭长,可见春秋时吴地的北部边沿,当在今徐州一带。吴国有名的勇士专诸,是“丰邑人”,②也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水系,北上黄池会盟。邗沟北端在今淮安县北,是故淮河以南,当属吴地。

吴地范围向西扩展,是通过与楚战争逐步实现的。吴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阖庐三年,吴王与伍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与濞。”③上述各地,均在今安徽境内。此后,吴军大败楚军于豫章,还曾攻入郢,迫使楚国迁都,“去郢徙都”。④可见吴国强盛时期,吴地范围已扩展到今安徽淮河以南;而其军锋所指,已深入到今湖北境内。今江西北部,春秋时为吴、楚接界之地,因称“吴头楚尾”,亦作“楚尾吴头”。⑤

吴国向东南方向开拓疆土,遇到的主要对手是越国。吴王阖庐曾与越王勾践在檇李大战,吴王伤指,“病伤而死。”夫差为父报仇“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栖于会稽,……请委国为臣妾。”⑥越国一度成为吴国的附属国,吴地的南部边沿,最远到达今浙江中部。吴越争霸的最终结局,是越灭吴。后来,楚灭越,秦又灭楚。吴地便成为统一的秦帝国的一部分。《史记·项羽本纪》载:“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便是指春秋时代的吴地。

秦汉时代的“吴地”,据《汉书·地理志》的划分,“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班固是东汉人,这里所说的“今”,当是指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班固还说:“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

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吴王刘濞的都城在广陵，直到东晋初，人们仍把广陵人看作吴地人士。^⑦淮南的寿春、合肥，被班固列入“吴地”之“都会”。严助与朱买臣都是会稽吴人，并且都担任过会稽太守。吴郡与会稽郡，在秦汉时期时分时合，故通称“吴会”^⑧，它们是“吴地”的中心地区，加上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诸郡，其地理范围与春秋时吴国极盛期间的疆域差不多。

东吴是三国之一，又是六朝的第一个朝代。三国上承东汉，其时的吴地范围，与《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吴地”，仍大体相似。六朝时期，吴地的概念也仍然是比较大的。以“吴州”为例，南朝梁陈时期设置过两个“吴州”，一个治所在吴县，一个治所在鄱阳；北朝北周时期设置的“吴州”，治所在江都。隋唐以降，吴地的概念逐渐缩小。因此，考察吴地人士与东吴兴亡的关系，吴地范围应该采用当时的地理概念。

二、孙吴政权的创建与吴地人士的支持

孙吴政权的创建，始于孙策；而孙氏势力的形成，则始于孙坚。孙坚年少时，以斩杀钱塘“海贼”而“显闻”，^⑨后来又参与镇压会稽人许昌在句章领导的起义，逐步得到提升。东汉末年，他先后出任盐渑丞、盱眙丞、下邳丞。句章在今浙江余姚东南。盐渑即海盐，今属浙江海宁市，东汉时属吴郡。盱眙又名盱台（今江苏盱眙县），东汉时属下邳国，下邳国在汉武帝时为临淮郡。《后汉书·郡国志》载：“下邳本属东海”，南朝梁刘昭注引戴延之《西征记》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别下邳城南，亦注泗。旧有桥处，张良与黄石公会此桥。”可见孙坚早年出仕的地点，由吴地的中心，逐渐向北转移，但并未超出吴地的范围。黄巾起义爆发，会稽人中郎将朱雋“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雋并力奋击，所向无前。”^⑩显然，孙坚早期的部众，来源于吴地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乡里少年”，来自他的家乡；另一个方面是“淮、泗精兵”，来自他出仕的地方。这两部分吴地人士，便是最早支持孙坚创业的基本力量。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舒属庐江郡，《后汉书·郡国志》载：“舒有桐乡。”刘昭注：“古桐国。《左传》昭五年吴败楚鹊岸，杜预曰县有鹊尾渚。”周瑜乃庐江舒人，与孙策“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⑪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周瑜随孙策征讨，后来辅佐孙权，推荐鲁肃，赤壁之战，立下大功。鲁肃是临淮东城人，东城又作“东成”，见《后汉书·郡国志》“下邳国”，故鲁肃与周瑜，均为吴地人士。

孙策在江都，遇到的吴地人士中，最重要的是广陵人张紘。孙策多次拜访，“咨以世务”，计划到丹杨投靠舅吴景，“收合流散，东据吴会”，^⑫张紘非常赞同，并希望孙策能建立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他到江东，随孙策创业，后来又最早建议孙权“出都秣陵”。^⑬

在孙策创业时期，与张紘并与参谋的，还有彭城人张昭。孙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⑭张昭尤为孙策所重，“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并被比作管仲。^⑮张昭在东吴文臣中很有声望，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只懂文而不知武的人物，史载：“孙策在吴，张昭、张紘、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⑯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张昭主张“用武治”。正因为这样，孙策才将“文武之事”都委托他去办理。

跟随孙氏父子创业的吴地人士，较早的还有丹阳故彰人朱治。他“初为县吏”，后“随孙坚征伐”，又扶翼孙策，赶走吴郡太守许贡，占据吴郡，迫使许贡入山投靠严白虎。孙策死后，

他与张昭等一起尊奉孙权号令,“征伐夷越,佐定东南。”^{①7}朱然,本为朱治妹子,姓施氏,过继给朱治为嗣。他与孙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任命他为余姚长、山阴令、临川太守等职,屡建战功。后随吕蒙夺取荆州,生擒关羽。吕蒙病危时,推荐他为继任人,孙权命他镇守江陵。朱然善于治军,很会打仗。他“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①8}吴郡吴人朱桓,当孙权为将军时,他“给事幕府,除余姚长。往遇疫病,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糒粥相继,士民感戴之。”后来,他与山越作战,“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在与曹魏作战中,也颇有战功。他关心部下,轻财贵义,记忆力很强,“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①9}所以,深得人心。其子朱异也是一位很能干的将军。还有吴郡吴人朱据,“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孙权称赞他“才兼文武。”^{②0}

吴郡吴人陆逊,虽出身于“江东大族”,但“少孤”,由从祖庐江太守陆康抚养成人。江东孙氏与陆氏关系甚密,史载东汉末,“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坚。坚整严救之。……贼闻而走。”^{②1}此处所说之“贼”,当指农民起义军。陆康之子陆绩,六岁时曾“于九江见袁术”。^{②2}当袁术与陆康发生矛盾,将要攻打陆康时,陆康遣陆逊及亲戚还吴。陆逊辈份虽小,却年长于陆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孙权为将军时,陆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使,出为海昌(今浙江海宁盐官镇)屯田都尉。陆逊在那里屯田,一方面开仓济民,劝督农桑;一方面与山越作战,“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后来,孙权将孙策的女儿许配陆逊,“数访世务”。陆逊向孙权建议:“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陆逊的策略,“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②3}所谓“东三郡”,即吴郡、会稽郡、丹杨郡。孙吴政权通过与山越作战,取得了大量的兵员和劳动人手,稳固了在江东立国的基础。陆逊是这一战略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与主要实施者。

支持孙策、孙权创业的吴地人士,还有许多人并非出于世族,其中不少是能征惯战之士,如:蒋钦,九江寿春人,“孙策之袭袁术,钦随从给事。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授兵。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②4}周泰,九江下蔡人,他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战有功。”与山越作战,周泰“身被十二创”,营救孙权,且“从讨黄祖有功。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②5}董袭,会稽余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迎亭,策见而伟之”。他在征讨山阴(今浙江绍兴)的战役中立了功,后“从策攻皖,又讨刘勋于寻阳,伐黄祖于江夏。”孙策死,“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②6}凌统,吴郡余杭人。“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陷锋”,后随孙权“讨江夏,入夏口”,“中流矢死。”凌统年十五便被任命为“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②7}后屡建战功。丁奉,庐江安丰人。《后汉书·郡国志》载:“安丰有大别山。”刘昭注:“《左传》昭二十三年吴败诸侯之师于鸡父,杜预曰县南有鸡备亭。”是当亦为吴地。史载丁奉“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②8}

吴地自古以来,有尚武之风。《汉书·地理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地人士的尚武精神,在支持孙吴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扬,而东吴

政权的建立,则又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天地,使他们彪炳于史册。

三、孙权对吴地人士的使用与控制

孙权于汉建安五年(200年)继其兄孙策统事。从黄武元年(222年)称吴王,黄龙元年(229年)称帝,到太元二年(252年)病卒,在位时间很长。他既是东吴的开国之君,又是守业之主。对吴地人士,他采取使用与控制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用人的特点。

关键时刻,重要岗位,放手使用,破格提拔,是孙权用人的最大特点。黄武元年,他称吴王不久,便遇到刘备的大举进攻,举国震恐。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西拒刘备,与之抗衡。陆逊在夷陵用火攻之计,以少胜多,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夜遁,入白帝城,惭恚身亡。陆逊声名远播,流传千古。黄龙元年,孙权称帝后由武昌迁都建业,留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胡三省云:“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三郡,豫章、鄱阳、庐陵也。三郡本属扬州,而地接荆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动,故使陆逊兼掌之。”^{②9}陆逊肩负辅佐太子、防御蜀魏及威镇山越等多种任务,孙权给他以“上大将军”的特殊荣誉,可谓知人善任。但太子的留守武昌,本身也包含着代表皇帝控制与监督的意思。

在地方官吏的选拔方面,孙权注重考察政绩,举贤任能,提拔那些能体察民情,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吴地人士,出任地方守宰,以稳定国家的基础。如:会稽乌伤人骆统,是个孤儿,其父被袁术所害,其母改嫁,他才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过万,咸叹其惠理”,颇有政绩。孙权嘉奖他,还将从兄孙辅的女儿嫁给他。骆统敢于直言,“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后来出任“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统死,复领其兵。”他针对“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病,民户损耗”的严重情况,向孙权上疏,申说“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的道理,使孙权深受感动。^{③0}吴郡阳羡人周鲂,初“为宁国长,转在怀安”,是一个地方小官吏。黄武中,由钱唐侯相、丹阳西部都尉提升为鄱阳太守,在郡十三年,“赏善罚恶,威恩并行”,颇有治理一方之才干。在军事上,周鲂“谟略多奇”,曾用计诱致魏将曹休入皖,并会合部众,随陆逊横截曹休,“斩获万计。”^{③1}他还多次平定山越宗帅的叛乱。会稽山阴人钟离牧,年青时曾居住在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后来出任南海太守,“威恩部伍、智勇分明,有古人之风。”^{③2}他还平定过建安、鄱阳、新都三郡的山越之乱。孙吴政权建立之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与山越宗部发生冲突,人民负担很重,孙权能紧紧依靠这些文武兼备,了解民间疾苦,有管理能力的吴地人士为核心,来逐渐平定叛乱,发展生产,从而增强了国力,扩大了东吴政权的统治范围,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对有重大缺点的吴地人士,尽管资历很高,孙权从大局着眼,不予重用,但仍注意检点自己的过失,与之搞好关系,使之心情愉快,安度晚年。如:孙策临终,曾对张昭等人说:“公等善相吾弟!”^{③3}孙权称吴王,始设丞相,“众议归昭”^{③4},孙权不同意。他任命北海(今山东潍坊、昌乐一带)人孙邵为相。黄武四年(225年),孙邵卒,“百寮复举昭”,孙权还是不同意,“乃用顾雍”。^{③5}张昭之始终不得为相,一因他在赤壁之战前曾主张降曹,二因他是否在是否应向曹魏送“质任子”的问题上,“犹豫不能决”。^{③6}孙权称吴王后,魏文帝曹丕“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并派吴郡人沈珩出使曹魏,沈珩以不卑不亢的言辞,巧妙地回答曹丕提出的问题。曹丕欲遣使往东吴,“并徵任子,权辞让不受。”^{③7}孙权要保持东吴的独立性,以图天下,张昭的主张使孙权大失所望,所以他认为张昭不是出任丞相的合适人

选。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史称张昭“功勋克举,忠谏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悼,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以容闾巷,养老而已。”张昭的优点是敢于直言,嘉禾二年(233年),孙权要派遣使者从海道去辽东,舰队满载金银财宝,以作为对公孙渊称“臣”的赏赐。张昭力加劝阻,痛哭流涕。孙权仍固执己见,派张弥、许晏出发。张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官,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⑩孙权与张昭之间这场火攻土掩的戏剧总算结束,说明孙权能正视自己的失误,他与张昭的关系非同一般君臣。从客观环境看,由于陆逊、薛综、陆瑁等人都上书相劝,使孙权不得抑制盛怒,冷静思考。侍中胡综又努力“协和彼此,使之无隙。”^⑪孙权要在江东立国,必须尊重大家的意见,不能一意孤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为了满足吴地人士的要求,孙权用吴郡吴人顾雍为相,平尚书事。这是东吴历史上,吴地人士为相的开始。顾雍的曾祖父顾奉,东汉时任颍川太守。东汉著名学者蔡邕避居吴地时,顾雍曾跟他学琴书,受到蔡邕的赞叹,因而以“元叹”为字,名声很大。顾雍为相十九年,一直做到赤乌六年(243年)病卒为止。史称:“顾雍依仗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⑫所谓“依仗素业”,是指顾氏为江南素族,在吴地实力雄厚。素族,是士族的异称,凡非宗室而为清流者,皆可称素族。^⑬顾氏与陆氏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顾雍长子顾邵,“少与舅陆绩齐名”。他们交游范围极广,“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在吴地及各地都有很大影响。孙权将孙策之女嫁给顾邵。顾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⑭孙权通过联姻,拉拢吴地世族,以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所谓“将之智局”,是说顾雍的智慧,善于处理政务,史称:“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⑮起初,孙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⑯“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潜忧壹乱国,每言之,辄流涕。壹白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后来,吕壹因陷害朱据,事情败露,孙权“乃务治壹罪”,“丞相雍至廷尉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乎?’壹叩头无言。”^⑰顾雍和颜悦色的长者之风,使其对手也无话可说。顾雍以缜密而宽容的作风治理国家。在他为相期间,虽然孙权与吴地人士之间也有过一些矛盾,但总的说来保持了国家的稳定。这确实是一种高度的智慧。

吴地是人文荟萃之地,东汉末年大批北方士人的南下,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进步,使东吴境内人才济济。孙权在治国过程中善于因地制宜,因才使用,使各种人才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对因言语过激,得罪过他的人,孙权一般采取免官或发配远地的办法处理,而不轻易杀戮。这种情况,到其晚年才有所改变。以吴地人士为例,如:会稽山阴人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他担任中书令,加侍中,劝孙权读贾谊《过秦论》,反对用“大辟”、“焚裂”等酷刑,并主张依礼、律检御臣下,“和而有正”。^⑱会稽山阴人贺齐骁勇善战,“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⑲会稽上虞人吴范“治历数,知风气”,“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⑳会稽余姚人虞翻,著《易注》,开以玄释经之风气,因性格“狂直”,“权不能容”,被徙交州,“而讲学不倦”。他与孔融有交往,虽酒宴上失言,得罪孙权,但未见杀。孙权还“因敕左右,

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④⑨}以防错杀。吴郡吴人张温，由于顾雍和张昭的推荐，“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后因“称美蜀政”，而遭废黜。^{⑤⑩}他为了教太子读史，曾节抄《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编撰《三史略》二十卷。^{⑤⑪}会稽山阴人谢承，为吴主孙权谢夫人弟，“撰《后汉书》百余卷”，^{⑤⑫}记事偏重于南方，有地方特色；被刘知几称之为“尤悉江左”。^{⑤⑬}吴郡乌程人吾粲，“虽起孤微，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⑤⑭}，曾任主簿、山阴令、参军校尉、昭义中郎将、屯骑校尉、少府、太子太傅等职。广陵海陵人吕岱，“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出守吴丞。”后来平定交广，清定南土，使“国家永无南顾之忧。”^{⑤⑮}沛郡竹邑人薛综，“其先齐孟尝君封于薛。秦灭六国，而失其祀，子孙分散。汉祖定天下，……乃去之竹邑，故遂氏薛。自国至综，世典州郡，为著姓。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史称“其枢机敏捷”，“信辞粲烂”，“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⑤⑯}彭城人严畯，“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是一位经学家。“鲁肃卒，权以畯代肃，督兵万人”，众人都向他贺喜，他却以“朴素书生，不闲军事”而固辞。“权为吴王，及称尊号，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他为官廉洁，生活节俭，“不畜禄赐，皆散之亲戚知故，家常不充。”^{⑤⑰}

孙权晚年，因长子孙登早卒，他本人年事已高，担心吴地世族势力膨胀，危及王权，其对吴地世族的态度，转向以控制为主。赤乌七年（244年），他任命陆逊为第三任丞相。陆逊掌握着兵权，孙权在称帝前尚能认识到“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⑤⑱}，对陆逊寄予希望。此时，由于情况的变化，他对陆逊充满了戒心。陆逊虽然担任丞相，但“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⑤⑲}仍然带兵驻扎于武昌，实际上就是只能出将，不能入相，不能回京直接管理中央政府的事务。当时，太子孙和与其同母弟鲁王孙霸之间发生摩擦，“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骖、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⑥⑩}孙权非常担心，害怕重蹈袁绍的复辙。陆逊于赤乌八年（245年）直接致书于全琮，全琮不纳，矛盾更为加深。全琮是外戚，吴郡钱塘人，他“善于承颜纳规”，^{⑥⑪}宗族子弟并蒙宠贵。到孙权少子孙亮统治时，全氏家族中有五人封侯，“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⑥⑫}东吴外戚之贵盛，莫有及全氏者。陆逊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曾多次从驻地武昌给孙权上书，条陈管见，还要求到首都建业，“口论谄庶之分，以匡得失，”孙权不听，还多次派使者去责备陆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⑥⑬}陆逊之死，使东吴失去了一位足智多谋，而又廉洁奉公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吴地人士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等人被流徙到交州。后来死在那里。张昭之子张休，被中书令孙弘陷害致死。太子太傅吾粲，因多次替陆逊递交书信，也受到诛连，下狱而死。还有朱据，也“以正丧身。”^{⑥⑭}这一事件，是东吴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冲突，也是孙氏集团与吴地世族之间矛盾的一次大爆发。陆逊才兼文武，功高震主，是吴地世族的领袖；其“论谄庶之分”，显然是干涉了皇帝的家庭事务，引起了孙权的不快，故乘机扩大打击面，连顾氏、张氏、朱氏等一起受损。这一事件的后果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孙权无异于自毁长城，为东吴政权的衰亡埋下了祸根。

四、吴地人士的不满与东吴政权的衰亡

吴地人士的不满，在孙权在位时即已开始。首先是统治者的沉湎于酒，奢侈多欲，横征暴敛，扰民以困，引起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如：孙权称吴王时在“武昌临钓台，

饮酒大醉。”张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待孙权遣人呼他回来时，他使用“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的典故，^⑤向孙权提出警告。孙权称帝后，为了“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派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因仙药没有找到，竟以“违诏无功，下狱诛。”^⑥陆逊上疏劝告孙权，“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⑦东吴境内人民负担太重，孙权为了满足政府庞大的财政开支，于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该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鄱阳贼彭旦等为乱。”实在是官逼民反。赤乌元年（238年）春，又“铸当千大钱”，加重对人民的掠夺。赤乌三年（240年）春，孙权自己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⑧东吴的许多豪族大地主，“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梁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⑨阶级矛盾的尖锐与人民的贫困不满，是东吴衰亡的最基本原因。

东吴衰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任命“骠骑将军步骖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分荆州为二部：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代陆逊镇武昌。”^⑩这样的人事安排，是孙权晚年为维护王权所作的一次大调整。步骖是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他来自吴地边缘，在江南没有多大势力。起初，“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骖为主记，除海盐长，还辟车骑将军东曹掾。”^⑪他是由秘书、地方小官、长官掾属一类低级职务逐步提升上来的。史载吴主步夫人，“与丞相骖同族。汉末，其母携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其长女鲁班，“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⑫步骖为相，靠的是裙带关系。当丞相后，他表面上“犹海育门生，手不择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侈，颇以此见讥。”由于他精于为官之道，“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⑬孙权用这样的人为相，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表面上“肃然”平静，骨子里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赤乌十年（247年）全琮、步骖相继死去，魏安丰太守王基说：“今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痼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⑭实在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

为了分散兵权，孙权在陆逊死后，将荆州重地的防务一分为二，分别由吕岱、诸葛恪二人管理。吕岱曾“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其人“清身奉公”，“为国勤事”，让他“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⑮，尚属称职。诸葛恪“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则是很不称职的。诸葛恪是琅琊阳都人诸葛瑾之子。他因“少有才名”，^⑯善于言谈，才思敏捷而被孙权所信任，其实不善于领兵打仗。史载赤乌九年，陆逊之子陆抗“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⑰要论治军之才，他远不如陆逊、陆抗。孙权将陆抗调离武昌，而将北方派人物诸葛恪派去驻守武昌，显然是对吴地世族陆氏世代为将有所顾忌。

孙权在临终前几年，也曾作过一些收揽吴地人心的工作。如赤乌九年，“吴人不便大钱，乃罢之。”^⑱赤乌十年，“吴主诏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有司奏言：‘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吴主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赋敛，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⑲孙权这种做法，一方面诚如其所言，是为

了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他百年之后，有人利用武昌旧宫称王称帝，与建业分庭抗礼。赤乌十二年（249年），“吴左大司马朱然卒。”当朱然病重时，“吴主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及卒，吴主为之哀恸。”^{②①}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同时“赐鲁王霸死。”并且，又杀了一些大臣，目的在于避免他身后“嫡庶分争”。^{②②}太元元年（251年）陆抗从驻地柴桑到建业治病，病略有好转，就要回部队驻地。孙权“涕泣与别”，并向陆抗表示歉意，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②③}孙权能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纠正自己的过失，向受害者的后人道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孙吴政权能得以延续，与孙权临终前着意收揽吴地人心，很有关系。

太元二年（252年），孙权封故太子孙和为南阳王，使居长沙；封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封孙休为琅邪王，居虎林。其目的是让孙氏宗族“处滨江兵马之地”，以巩固孙氏集团在江南的地位。临死时，他“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②④}让他们共同辅佐少子孙亮。

孙权死后，东吴统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火拼。先是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欲矫诏杀恪，因孙峻告发，反被恪所杀。诸葛恪辅佐孙亮即帝位后，徙齐王孙奋于豫章，徙琅邪王孙休于丹阳。他秉政后，裁撤监视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积欠政府的逋债，除去关税的杂税，开始时得到吴人的好感。由于他是孙“和妃张之舅”，又“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②⑤}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因围淮南新城不克，“众庶失望，而怨黷兴矣”^{②⑥}，被孙峻杀掉。孙峻死后，其从弟孙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太平二年（257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来附，孙綝率众救寿春。吴将朱异因“军士乞食引还”^{②⑦}，“为孙綝所枉害”。孙綝滥杀“吴国忠臣”，^{②⑧}孙亮以孙綝“专恣”，与全尚、刘丞密谋诛綝，事败，被废黜为会稽王。孙权第六子孙休即位后，以大将军孙綝为丞相、荊州牧。孙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②⑨}。孙休便与张布、丁奉定计，因“腊会”之时，斩杀了孙綝。^{③①}吴地人士卷入了孙氏集团内部的争斗，而孙綝之被杀则与他滥杀吴地将领所引起的不满有关。

孙休做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了。当时，蜀汉已亡，东吴政权面临更大的危机：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孙和的儿子孙皓为帝。孙皓是有名的暴君，粗暴骄盈，又好酒色，喜欢滥杀无辜，施用酷刑。濮阳兴、张布均被他所杀。甘露元年（265年），他“又送休四子于吴小城，寻复追杀大者二人。”^{③②}该年九月，他听从西陵督步阐的建议，“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陆逊族子陆凯上疏，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进行劝阻，并说：“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希望孙皓能“上应天心，下合地意”，留神思考他的话。陆凯敢于直言，常“犯颜忤旨”，孙皓因为他是“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③③}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

孙皓统治时期，吴地世族陆氏，仍然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世说新语·规箴第十》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复亡是惧，臣何敢言盛！’陆凯当时担任左丞相，注引《吴录》曰：“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

东吴后期对曹魏与西晋的防务，主要依靠陆抗。史载：太平二年（257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③④}这次事件中，外戚

全氏家族中的“全怱、全端、全祗、全仪等并因此际降魏，全熙谋泄见杀，由是诸全衰弱。”^④永安二年（259年），陆抗被拜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建衡二年（270年）又“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全面负责对西晋的防务。凤凰元年（272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步阐是步骞之子，累世在西陵。陆抗率军扑灭叛乱，收复西陵，“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晋军统帅羊祜不得不引军以还。天纪三年（279年）秋，陆抗病卒。次年，晋军伐吴，“王濬顺流东下，所至辄克”^⑤其情景与陆抗生前所忧虑的完全一样。正如唐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所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东吴灭亡后，陆抗之子陆机、陆云，顾雍之孙顾荣，薛综之子薛莹，都到了洛阳。晋武帝问薛莹：“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薛莹回答：“归命侯臣皓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⑥薛莹所说的情况是非常真实的，孙皓在饮酒时杀的著名人士，便有侍中韦昭及常侍王蕃。韦昭是东吴著名史学家，著有《国语》注及《吴书》。孙皓要他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以孙和不登帝位，只宜名为传相拒绝，因此得罪孙皓。后来，孙皓便借口他不肯多饮酒而杀。王蕃平时不喜欢奉承，有时还提点意见，孙皓便在酒会上说他是假醉，斩杀于殿中。东吴灭亡前夕，后宫宫女将近万人。宫人有不称意而被杀，扔进水中的更不知其数，至于剥面皮、凿眼睛等酷刑更是司空见惯。如此暴君，当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当晋、吴军队交战之时，“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⑦东吴确实是非亡不可的了。

东吴所处的三国时代，是封建割据的时代。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兴衰，与其统治者能否得民心，取得地方人士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对孙吴之兴衰，陆凯在生前给孙皓的上疏中，曾从二十个方面将孙权与孙皓作了比较。陆机入晋后撰写的《辩亡论》，对东吴的兴亡，作了更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孙权“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睇光而景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江东多士，吴地人才济济，是孙吴政权割据山川，跨制荆扬，而与天下争衡的重要优势。孙权死后，“幼主莅朝，奸回肆虐。”开始时“故老犹存”，有陆抗、陆凯这些良臣扶持，“元首虽病，股肱犹良”，所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这些精辟的论断，正是吴地人士在东吴亡国后痛定思痛，发出的肺腑之言。

责任编辑 徐启彤

注释：

- ①《通志·氏族略》。②③④⑥《史记·吴世家》及三家注。⑤语出洪兴《职方乘》及祝穆《方輿胜览》。王士禛《江上》诗：“吴头楚尾路如何”。朱熹《铅山立春》诗：“春回楚尾吴头”。⑦《通鉴》晋元帝太兴四年：“豫州刺史桓胤，以戴渊吴士”，胡注：“渊，广陵人，广陵，故吴王濞都也。”⑧《后汉书·蔡邕传》：“亡命江海，远迹吴会。”⑨⑩⑪《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及注。⑫⑬《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及注。⑭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⑯⑰⑱《三国志·吴书·张纡传》及注。⑲⑳㉑㉒《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及注。㉓㉔㉕㉖《三国志·吴书·陆绩传》。㉗《三国志·吴书·朱治传》。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㉙《三国志·吴书·朱桓传》。㉚㉛《三国志·吴书·朱据传》。㉜㉝㉞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㊱《三国志·吴书·蒋钦传》。㊲《三国志·吴书·周泰传》。㊳《三国志·吴书·董袭传》。㊴《三国志·吴书·凌统传》。㊵㊶《三国志·吴书·丁奉传》。㊷《通鉴》魏明帝太和三年。㊸《三国志·吴书·骆统传》。㊹《三国志·吴书·周鲂传》。㊺《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㊻㊼㊽㊾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及注。（下转第98页）

教训》、《济贫医院》、《一盞粥》、《自卫》、《旅费的损失》、《第一次吃客饭》、《十六元之代价》等。极为难得的是短篇小说《卖菜儿》是从赞美的角度写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福哥儿，天天出去卖菜，靠微利和双目失明的老母度日，老主顾布店老板真君芝一日突然不见了10块大洋，伙计认定是福哥儿所为。为了不使伙计失去饭碗和不让老母伤心，竟自认是他拿了去赌钱，希冀赢钱来为母亲做寿衣的，并愿意每日节省10文8文，5年中一定还清。却在福哥儿将还清之际，老板因整修橱子，发现钱乃因抽屉板松动而掉入橱底，老板与伙计乃感动不已。这篇小说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贫家子弟的高贵品质。作者在字里行间由衷地表示了一种钦佩之情。在众多以暴露为宗旨的小说题材中，《卖菜儿》犹似在闷热令人窒息的盛夏里吹来的一阵清风，确实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还有一些思想意义不大，但在艺术上尚可鉴赏的小说，甚至有的是游戏文字，如《阴阳怪气》。

俞天愤同时又是一个非战小说家，在他的创作中有一组刊登在《红玫瑰》前两卷的非战小说特别引人注目。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1924—1925年江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战乱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灾民群众哀鸿遍地，令人惨不忍睹。作者以他在前线、灾区的耳闻目睹，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军阀置民生国计而不顾发动内战的罪行，表现了人民迫切要求过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类小说在俞天愤的全部创作中最具社会价值。小说虽无曲折离奇的情节，然而由于作者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在那客观写实中，包藏着作家强烈的爱憎感情和巨大的控诉力量。这类小说有《危

城九日记》、《“烤”的成绩》、《灾民泪语》、《拉夫惨语》、《鼓楼上的悲声》、《连长的家报》、《伤兵的觉悟》等。目睹战乱给江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亲自站出来加入那非战的呐喊：“战争，战争，简直是江南人民的劫运罢了”！这一组非战小说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上，真有点别开生面，不同凡响，跟鸳鸯蝴蝶派的主旋律显然有些不合拍。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组非战小说，使我们对俞天愤创作进行评价时有了格外要另眼相待的理由。

综览俞天愤的小说创作，可以这样说，他以众多的社会小说，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各个不同的阶层，各类不同的人物给我们描摹出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的现实，颇具立体感。他的作品与众多的新文学作家的小说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那个历史阶段的一幅完整的社会势态图。俞天愤虽然是以侦探小说成名，然而他的社会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上的客观写实的风格以及白描的笔法却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徐天啸当时就评论他“能折衷得新旧两派”，真是独具慧眼。确实俞天愤大部分社会小说，尤其是非战小说放在同时期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一点也不逊色，因此我们如果说俞天愤是通俗文学作家队伍中的一位比较严肃的作家，应当是不会有有什么异议的。

责任编辑 宗祥

注：

①③④⑤郑逸梅《小品大观·俞天愤》上海提经山房1935年第8版。②⑥徐天啸《俞天愤》，《小说日报》1923年1月31日。⑦《俞天愤的研究性》，《红玫瑰》二卷四十期。⑧程子青《谈侦探小说》。

(上接第107页) ③⑨《三国志·吴书·胡综传》。④④③《三国志·吴书·顾雍传》。④④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之《读史释词·索族》。④④《三国志·吴书·顾雍传附子邵传》。④⑤《通鉴》魏明帝景初二年。④⑥《三国志·吴书·阚泽传》。④⑦《三国志·吴书·贺齐传》。④⑧《三国志·吴书·吴范传》。④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④⑩《三国志·吴书·张温传》。④⑪《隋书·经籍志二》。④⑫④⑬《三国志·吴书·妃嫔传》。④⑭《史通·烦省篇》。④⑮《三国志·吴书·吾粲传》。④⑯⑰《三国志·吴书·吕岱传》。④⑱⑲《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及注。④⑳《三国志·吴书·严陵传》。④㉑④㉒《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及注。④㉓《三国志·吴书·全琮传》。④㉔葛洪：《抱朴子·吴失篇》。④㉕④㉖《通鉴》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④㉗④㉘《三国志·吴书·步骘传》。④㉙④㉚《通鉴》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④㉛④㉜《三国志·吴书·诸葛亮传》及注。④㉝④㉞④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附子抗传》。④㊱《通鉴》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三月（案：是年四月改元，三月当为正始十年）。④㊲《通鉴》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④㊳《通鉴》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④㊴④㊵④㊶《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注。④㊷《三国志·吴书·朱桓传附子异传》及注。④㊸《三国志·吴书·陆凯传》。